特别策划·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⑪

从“道路探寻”把握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解决实际问题的“道路探寻”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通过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的新征程上，我们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道路探寻”的主动权，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

■ 虞海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思想伟力，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道路探寻”历程中得出的历史性结论。

“道路探寻”是把握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的根本主线

尽管马克思主义诞生在19世纪，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这是马克思主义“行”的基石。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的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播下革命火种的小小红船到领航复兴伟业的巍巍巨轮，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飞跃，都是围绕“道路探寻”问题展开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面临着多次道路问题的重大抉择，每一次抉择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条件的不同，探寻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在中国“道路探寻”过程中的每一步，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息息相关。因此，“道路探寻”是把握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的根本主线。

中国共产党探寻中国道路的历史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历史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十月革命，中国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理论武器，但是十月革命没有并且也不可能送来现成的革命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际，打破了对“城市中心论”这一道路的教条理解，克服了“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的错误，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走出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第一步，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不断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大问题摆在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面前。从“互助合作”到“和平赎买”的路径创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社会的变革，引导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随后，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结合的核心，就是独立思考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党既反思了一段历史时期内对“苏联模式”的照搬，又通过不断探索，展现了我们党在“道路探寻”上所具有的独立性和主动性。虽然，这样的探寻在后来的实践中走了一些弯路，但这种探寻的价值不容否定和抹杀，为后来邓小平同志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1978年，我国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就把焦点放在了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探寻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根本所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这条道路需要思考的起点。在如何避免“老路”和“邪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立足“富起来”的历史方位，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进行追问；从“以我为主”到“中国特色”，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新”表现在，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如何走好强起来的道路，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阶段，我们党不断推进解决人民生活“好不好”、国家“强不强”、政党“硬不硬”的根本问题，努力实现从大国成为强国的奋斗目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实际紧密结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其核心就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空背景下，探寻实现“强起来”的道路。正是在对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的探索中，创立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牢牢把握“道路探寻”的主动权意味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将会越来越“行”

马克思曾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问：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面对整个世界的不稳定不确定、动荡变革及其系统性风险，新时代以来的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实现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进一步说明在不断地“道路探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创立了中国理论，确立了中国制度，弘扬了中国文化，从而在国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中国奇迹，在世界上作出了世所公认的历史贡献，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因而使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范本。在解决实际问题的“道路探寻”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因此，它不仅“行”，而且将来会越来越“行”！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道路探寻”的主动权，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的新征程中，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

（作者为华北电力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研室主任）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22MS059）的阶段性成果。

艺苑映像·女摄影家影像录

姜明彩：让聋儿听到美妙的世界

■ 张剑虹 文/摄

1995年，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聋儿康复学校成立，仅有几间房子，3个教师和6个聋儿学生。校长姜明彩和老师们既当老师又当妈妈，白天教学生学说话，晚上陪学生睡觉。当时，姜明彩没有把握做好特殊教育，她的母亲对她说：“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是对的，对社会有意义、有价值就去做，我永远支持你。”母亲的一番话让姜明彩坚定了信念，一晃办学20多年，学校累计培育了1000多名聋儿，一批批孩子逐渐康复，进入普幼、普小继续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我为聋儿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且微不足道的，我只是利用自己的专业为孩子们创造康复的机会。”对于外界的称赞，姜明彩总是这样回答。

姜明彩一直有一个心结。十几年前，一位奶奶带着孙女来学校咨询，当听到康复需要佩戴助听器时，那位奶奶嘴里不断地说：“孩子，咱家没钱给你配助听器，你没福气，还是和你爸爸妈妈一样去聋哑学校学习手语吧！”虽然姜明彩答应给孩子免学费，但那时一对助听器大约七八千元，普通家庭难以承担这份支出。“如今政策好了，政府为聋儿提供免费助听器、免费植入人工耳蜗、免费康复训练。”姜明彩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这些年，姜明彩获得了山东省三八红旗手、山东省残疾人康复工作先进个人、山东省新长征突击手等荣誉称号。“小小的肩膀，大大的能量”这是身边人对姜明彩的评价。她的初心就是让聋儿听到美妙的世界。看到一个个聋儿能够正常交流，姜明彩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值得。

（作者为山东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潍坊市女摄影家协会会员）

▲ 姜明彩和孩子们一起上音乐课。

▲ 姜明彩在给孩子检查听力。

学人关注

世界大变局视野下的妇女与性别史研究

·阅读提示·

近日，“世界大变局视野下的妇女与性别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这场跨文化、跨学科的学术盛会，为国内中国史学者与世界史学者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呈现了国内妇女与性别史研究在内容、视角和方法上的进展。会议还邀请了多家媒体和妇联系统代表参与，力图实现学者、妇女组织和媒体的协同合作，推动该领域研究成果走向社会大众。

■ 鲁迪秋

近日，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上海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妇女与性别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世界大变局视野下的妇女与性别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等单位的百余名学者参与了这场学术盛会。

历史上变局之下的女性处境及其主体性作用

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怀抱强烈现实关怀，探寻历史上身处大变局下的女性处境及其发挥的作用。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丹和复旦大学博士生王昭从不同角度考察了五四新文化浪潮对近代中国女性的影响。前者聚焦左联女作家的成长，后者揭示妇女解放话语落地的艰难。中山大学特聘副研究员柯佳昕比较了抗战时期沦陷区与国统区妇女期刊对母亲战争角色的塑造与利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王晶玉分析了19世纪上半叶美国早期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洛厄尔女工形象的重塑及其意义。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生姚敏侠以芜湖市为例提出，在1950—1953年全国开展的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女性积极主动地推动了自身的解放。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高照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王旭娇关注美国进步时期的女性改革者，前者阐释了简·亚当斯的“新和平理念”，后者探究了莉莲·瓦尔德保护儿童的一系列措施。清华大学博士生仇振武分析了19世纪晚期英国社会改革家玛丽·卡彭特在推动教管学校兴起中所作的贡献。

妇女与性别史研究的历史梳理与理论创新

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女性不仅是政治参与的主体，还是国家治理的对象。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焦杰等考辨北魏京兆王元愉宠妾杨奥妃生前卒后身份的转变，展示了封建社会妇女的“第二性”特征。贵州大学副教授李勇等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重新评价了武则天的功绩与局限。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副教授郑明月以地方志为基础，探析了清代贵州地区妇幼慈善事业的特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曹晓华以中国近代两份女性刊物为例，分析了从晚清到民国时期，面向女性的“卫生”科普如何塑造女性的社会和家庭角色，进而转化成为一种“治理”技术。

理论创新是对积累经验的突破，也是推动国内妇女与性别史研究推陈出新的重要基础。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杜芳琴梳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欧美女性主义三大理论从平等向正义的转型过程。广西师范大学讲师林漫考察了美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与史学问题。除了引介国外女性主义理论，与会学者还十分重视这些理论思想的本土化与实际运用。山西师范大学教授畅引婷以杜芳琴“华夏族父权制研究”为例，阐述了中国妇女理论的本土建构及其意义。常熟理工学院副教授程新贤探索了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引入社会性别理论的方式与思路。

女性的婚姻家庭生活与公共生活

与会学者关注到知识与教育，这是女性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前提。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胡博文分析了正史《列女传》中知识对于女性功用的嬗变及其意义。上海理工大学副教授宋青红等聚焦广东女子中学教育，讨论国民政府男女分校政策的影响。复旦大学硕士生顾获飞以上海妇女补习学校的改造历程为例，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改造的复杂性。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讲师姜玉杰以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密歇根大学为例，剖析了美国高校女学生的学院生活。

与会学者还就不同时空的婚姻家庭，以及相关制度、法律、观念的变迁，各抒己见。

苏州大学教授铁爱花考察了宋代家法的传播及其对女性的规范。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菁探讨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节烈现象。复旦大学博士生孙仁朋重新审视了古典时期雅典嫁妆的“担保”内涵及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倪滕达追溯了古代罗马帝国元首塞维鲁发布的一项“敕答”，由此考察罗马帝国女性有限的堕胎自由。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悦揭示了拜占庭帝国中期“婚姻法”的三个特点：政治性、目的性和开创性。

国内妇女与性别史研究的进展

总体而言，本次学术研讨会呈现了国内妇女与性别史研究在内容、视角和方法上的进展：

第一，研究内容广泛。近年来，国内妇女与性别史领域的发展趋势从纯粹的妇女史研究，逐渐转变为妇女与性别史研究。与会学者不仅关注中外历史上的各类女性群体、女性地位，还探究男性气概的形成。山东大学教授王向贤深入探讨先秦儒家父职的意涵及其对当代亲亲重构的作用。香港理工大学讲师何宇轩分析了清代士人家训中有关男性对家中女性成员的管理观念，由此揭示古代男性气概的塑造过程。复旦大学博士生杨凡以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为中心，分析了早期希腊男性气质的话语建构。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乔玉红解析了明清“假女”案。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乔炎梳理了西方男性史研究发展的历程。

第二，研究视角新颖。参会论文不仅涉及精英女性的历史，更致力于呈现普通女性的经历，展现不同女性群体在地域、阶级、文化程度等多方面的差异，真正将“交叉性理论”运用到具体的史学实践中。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生周美玲聚焦城镇酿酒女，探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

第三，研究方法多样。与会专家丰富的研究充分显示妇女与性别史领域正在发生“文化转向”。这一领域从社会史的子域，逐渐与文化史结合，不断从文学、人类学等学科借鉴概念、理论和方法。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裔昭印关注女性身体，探究了古希腊人的女性净化仪式。华东师范大学讲师王燕讨论了1920—1937年间，城市节日仪式如何塑造和传播妇女“劳动”。

此外，与会学者不断突破创新，开拓了妇女与性别史研究的史料范围。除了文本材料外，学者们还使用了包括墓志、画像石、手工艺品等在内的实物材料。中山大学教授林英考察了一件金高足杯的器型和图像。

本次研讨会为国内中国史学者与世界史学者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促进妇女与性别史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会议邀请多方媒体和妇联代表参与，力图实现学者、妇女组织和媒体的合作，推动该领域研究成果走向社会大众。裔昭印教授在会议总结中建议：中国妇女与性别史研究要具备全球视野，并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注意研究中外不同女性群体之间的共性与差异；进一步开展跨学科研究，丰富研究的内容；妇女与性别史研究者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世界大变局的背景下，致力于构建和谐的性别关系。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